

海外著名学者

编者按：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开设“海外著名学者”专栏，向读者推介海外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重点介绍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欢迎投稿！本期特邀刘宏博士撰文，评介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王赓武教授的学术经历和治学方法，以飨读者。

王赓武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观察

刘宏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 新加坡)

[关键词] 王赓武；海外华人研究；方法论

[摘要] 作为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王赓武教授的治学方法对其研究以及该学科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王教授的成长经历与学术训练，探讨他由治中国古代史入手，转而侧重研究中国—南洋关系史以及东南亚华人史的时代背景及其学术含义。本文认为，坚实的中、西学术训练为他的学术生涯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他转入海外华人这一新兴领域的桥梁；而战后东南亚激剧的时代变迁则促进王教授的双重学术视野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双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与东南亚的交互相映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关怀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学术研究的参照系。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3)01-0062-08

Professor Wang Gungwu and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his methodology

LIU 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Key words: Wang Gungwu;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methodology

Abstract: As the doyen of the studies on the Chinese Overseas, Professor Wang Gungwu has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merging field of scholarly enquiries. This essay focuses on hi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bi-focalism: the revolving concern over the region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imultaneous positioning as a detached analyst and involved participant. His training in Sinological tradition, changing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 Southeast Asia within which he has spent better part of his life, and his keen observat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facet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ocieties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making of his mythologies, which in turn has had an impact on the whole field.

[收稿日期] 2003-01-12

[作者简介] 刘宏(1962-),男,历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助理院长。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及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客座教授。

近两年多来，笔者有幸应邀参与了几项与王赓武教授相关的学术活动，^[1]对他的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当《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主编嘱我为该刊新增的“海外著名学者”栏目写一介绍王教授的文字时，我欣然应答。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非全面讨论王教授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影响——这涉及对整个学科的学术史回顾，远非笔者能力所及——而是以王教授的方法论为切入点，讨论他在研究海外华人时所采取的立场和研究视野。

一 多元学术与双重视野

毫无疑问，对海外华人事务感兴趣的读者都熟悉王教授在该领域的成就和贡献，^[2]但是，或许有些人不知道，他的学术涵盖面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领域。对中国及海外华人问题均有深入研究的原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早在1982年就曾评论道：“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史家，王赓武教授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对近代中国史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按：指王于1981年出版的《社群与国家：论东南亚与华人》）只涉及东南亚。即使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也展现了他的三个学术角色：汉学历史学家、马来西亚事务的权威性评论者，以及南洋华人问题的专家。”^[3]实际上，也正是这些多重的学术角色与贡献使王教授被选入东西方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等。

（一）个人经历与学术训练

这种多元的学术角色是与王教授的个人成长、教育训练和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

王赓武于1930年生于印尼泗水，其父王宓文出生书香世家，本人为南京东南大学毕业生，时为泗水第一间华校的校长；他后转赴马来亚，任霹雳州副视学官。^[4]因此，王赓武少年时期是在怡保度过，就读的是以英文为媒介的安德森学校。而他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则是由父母亲培养：“在三、四岁时，家母就开始教我认字、背书和抄写汉字。此后，家父教我古文，从《三字经》教起。不过，他知道父亲教儿子很难教好，所以特地在家里办了一个班，让我和我的朋友的子女一道学习中文。”^[5]

因此，中英文的双语教育为少年的王赓武打开了两扇天窗，使他开始同时看到了两种不同文化及其长处。在16岁时，他用英文在《安德森校刊》（1946年）上写了一篇《圣人孔夫子》的短文，既强调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注意到中西比较文化的一些特点。

中学毕业后，王赓武赴南京中央大学就读，开始与中国本土文化与社会有了直接的接触。虽然他的少年中国之旅在1948年随着内战爆发而结束，但是，对中国及其历史与文化的深切关怀却始终伴随着他。1985年起他担任香港大学校长，他表示：“我很喜欢香港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靠近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各种变迁，对中国进行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对我来说，在香港的九年半是个很有意义的时期，中国的变化相当大，我很受感动。”^[6]

回到马来亚后，王赓武先是就读于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并于1954至1957年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中国历史学家Denis Twitchett和东南亚史的奠基人霍尔（D. G. E. Hall）。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五代时期的政治，后由马来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出版，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五代政治史的重要参考书。^[7]

因此，当王赓武于1957年回到马大任教时，坚实的中西学术训练为他日后学术生涯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他转入海外华人这一新兴领域的桥梁。而战后东南亚激剧的时代变迁则促进他的双重学术视野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双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与东南亚的交互相映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关怀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学术研究的参照系。

（二）中国与东南亚

如前所述，王赓武的博士训练是在中国中古史方面。然而，回到马来亚大学执教之后，主客

观的因素使他无法继续专注于这一领域。一方面，五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是对外封闭的，在马来亚这样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中国研究成为敏感的政治课题，各种原始资料也不易获得。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是战后方兴未艾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使“我获取了一种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这是个人作为侨居者向自觉决定定居在中国之外的第一步。”^[8]新兴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建立在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建构基础之上，因此，王赓武与其同事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马来亚历史与政治的专著，并开始直接迈入海外华人研究领域——这在1950年代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除了少数几位中国和西方学者的（如许云樵、姚楠、施坚雅、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等）学术著作之外，多数的研究还很初步，尚属于资料整理与介绍。

从研究方法看，当时有关的研究大多是以中国为出发点或中心的论述。如许云樵主要采用中国古籍中有关东南亚的史料；施坚雅、弗里德曼等均为研究中国本土社会的人类学家，由于1949年后中国闭关自守无法进入大陆，因而转为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作为受过中国历史系统训练的“东南亚华裔学者”，王赓武对海外华人的研究是从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开始的，并立足于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关注。他的早期著作充分反映了这一点：1958年出版的《南海贸易：早期中国与南洋贸易史》长文以及次年出版的《南洋华人简史》^[9]。前者着眼于南海贸易、郑和远航、防御性朝贡体系、苦力贸易、商人网络等论题；后者（原为在砂捞越广播电台所作的系列广播稿）则以南洋华人的立场，从近距离考察南洋华人社会的历史及其在战后的变迁。本书中译者张奕善指出，“作者不论所持的观念及编年史叙述都与中日学者所持者异趣。每樁史料的处理都能反映出时代的意义。”^[10]至此，贯穿于王教授学术生涯的两个交叉关注点：中国与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群已基本形成，它们反映了对区域和族群（以及民族主义）的双重关怀，并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和相对独立性。

对东南亚及其华人社群的关怀并未使王赓武放弃他的“初爱”——中国历史。六十年代末的“文革”及其非理性化促使他反思历史与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也正是在此时，他应邀出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史讲座教授暨系主任，使他“既能够研究中国，又能够研究海外华人社群”，并将“中国对这些社群的看法与海外华人的自我认知的互动放在心上，这种互动引导着我的主要著述，直至今日。”^[11]这种双重互动也直接体现在王教授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上。1968年，他应美国的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 (John Fairbank) 之约，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撰写了有关早期明朝与东南亚关系的论文（该书的其他作者包括当时早已成名的杨联升和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等人），费氏认为该文是篇“大师级的作品”（“A Masterly Study”），是“迄今为止有关清朝之前朝贡关系的最全面论述”。王赓武本人也认为，他的中国视野以及对西方入侵之前东南亚的研究成为一个支点，“有助于我往后看到东南亚的建构时期以及往前看到该区域充满活力的数世纪的变迁。”^[12]

（三）自我与社会；参与者与旁观者

王教授对中国与东南亚以及华人社群的研究是以历史作为切入点和出发点的，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将他的历史学训练和区域知识用于阐释二战后亚洲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变化。而这种阐释又是与他的双重定位和移动视野密不可分的。他是同时站在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立场上来审视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嬗变的。

他自己首先是二战后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之历史性巨变的产物和参与者。在战前，无论是从其父母亲立场或自身的角度，王赓武都自认为是“中国人，并准备在将来回中国”。然而，战后形势的变化使他们意识到这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他们也因此成为历史浪潮的一部分。王教授曾多次对笔者表示，对其父王宓文先生来讲，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放弃中国国籍而选择当地国籍，是一种非常痛苦但又不得不为之的选择；他自己对此亦深为了解。但作为成长于南洋的年轻一代学人，王赓武自身的中华文化包袱可能更轻些，认同的变迁也许是一种更容

易被接受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使自我完全从属于社会，而是能够站在时代的浪尖上来俯视那整代人的选择及其由此产生的失落与再生。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了解以及对南洋情势的洞察使王教授能够把学术视野从古代推移到当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南洋华人简史》其实是一份历史文献，记载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那一整代人的思考与调整及其历史内涵。

在现实生活中，王赓武并非仅仅是被动的受影响者，而是积极的实践者，并以这些实践来充实和验证他的学术研究。这些实践既有体制内的，又有体制外的。作为前者，他在1957年回到马大后不久，就晋升为正教授和文学学院院长，这在种族政治高涨的六十年代，是十分罕见的。到了1985-1995年间，作为香港大学的校长和香港行政局议员、香港环境污染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演艺发展局主席，他不仅近距离观察中国变迁，而且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中港交流作了积极的贡献。^[13]

作为体制外的参与者，王赓武于1968年初与另外五位社会政治活动家共同组织了马来西亚民政运动（Gerakan，简称民政党）。作为马国政治中的反对党，民阵党在其初期主张“多元种族主义、温和的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成为马来西亚政治浪潮中的三大流派之一。^[14]在七十年代初期，他还积极投身于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在澳洲亲身参与和平示威活动。^[15]

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实践使王赓武能够以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视野来分析问题，这对他的研究起到了有益的帮助。例如，他在七十年代初为权威性的《中国季刊》等期刊所写的论文《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及《马来西亚竞争性的权贵》无疑受益于他作为一个直接参与者、但同时又能够置身于场景之外的观察者身份。而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也使之能够在香港回归前的关键时期从理性的角度推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教育政策（如广泛招收来自大陆的研究生，主张港大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性等等）。

作为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学者，王赓武在社会与学术方面似乎找到了某种平衡，并融合了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知识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和西方传统中知识分子作为“权力的批判者”的立场。而这种有条件的融合恐怕亦受益于王教授多元的经历和观点。

二 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

如前所述，王赓武的学术训练是历史学的训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拘泥于传统史学方法的学者；其实，部分地由于他有意识的追求，部分地由于海外华人这一领域与生俱来的跨学科特点，王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视野。这一实践也与他对社会科学及其在亚洲的产生、发展及作用的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及其亚洲化^[16]

王赓武对社会科学的核心看法是它是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学问。他认为，作为一门传统学问，人文学科主要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社会科学则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这固然与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的影响有关，它同时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虽然他对社会科学能否真正成为“科学”持怀疑态度，但对从欧洲学术传统中脱颖而出的社会科学仍然十分推崇，认为它与美国的社会科学传统有所不同：前者更为重视历史与哲学，而后者则倾向于数学模式或理性选择理论，因而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

作为亚洲史学家，王赓武也十分关注社会科学的亚洲化问题。他指出，当20世纪初社会科学传入东亚和东南亚时，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已牢固确立，因而使亚洲只能作为吸收者的身份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种状况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并未根本改变，不过，到了这时，亚洲的社会科学已产生自身的特征。例如，王赓武认为在西方高等教育机构中，“范式变迁通常来自学术与知识活动……而在亚洲，范式变迁深受情境制约，经常受到当时的政治和

经济发展的影响。^[17]

(二) 海外华人研究中的方法论

王赓武对社会科学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他对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他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尤其表现在他的著作中对历史进程及其因果关系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他也有选择地采用社会科学的一些思考方法与研究范式，但他并未将社会科学系统地以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引用。

王赓武的历史学视野主要反映在他对长时段发展及其阶段性变迁的关注。由于他倾向于使用宏观的角度和定性的方法 (qualitative) 看待海外华人的历史，因此，他特别注意其历史不同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力。例如，在分析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侨居经验时，他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与半殖民时期的过渡性国家阶段；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阶段；再移民到北美和大洋洲的移民国家阶段；以及最新的将侨居延伸为移民的全球化的阶段。^[18]他也指出，“至于学术方法而言，我从未试图系统地采用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作法，即将研究海外华人所得的观点用于解释中国社会本身。我既没有强调华人同化的许多历史和当代模式，也不同意只是考察华人回应东南亚民族主义的新方式的研究。取而代之，我的研究总是在两个充满希望和含义模糊的立场之间运动。一个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希望最终将所有海外华人视为侨居者，是中国人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在切实需要时是可以指望的。另一个是华人移民和定居者的希望，他们希望他们的子女某种程度上在文化上依然是华人，而且至少确保几代的血统。”^[19]

不过，对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视也使王赓武的著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说历史学的与训练使他注重纵向的长时段进程、因果关系、阶段性变迁等因素，社会科学的影响或许表现在他对横向的社会/阶级分层与类型的关注。如他在分析海外华人移民的模式时，将之分为四种形态：华商、华工、华侨和华裔。对于近现代海外华人的双重政治倾向，则将之分为 A、B、C 三类。此外，王赓武也十分重视西方学术界有关同化、认同、归化的理论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华人的认同理论。^[20]王赓武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观照也反映在他对移民及其全球化的研究上。

在他为其主编的《全球历史与移民》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他强调了因科技、交通的进步而产生的对移民的影响，并透过对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相关移民理论的介绍，尝试将华人经历置于比较的框架之中。^[21]在最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海外华人：从乡土中国到寻求自治》中，王赓武也仍然将海外华人历史置于中国、各相关区域以及全球语境下加以考察。因此，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 (Philip Kuhn) 认为该书详细分析了“当代全球史的大主题：亚洲与欧洲文明的相会；作为中间商的少数民族的作用；游移不定的族群性和散居者意识，以及文化维系和同化之间的张力。”很明显，后面两个主题更多的是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和论题。

综上所述，由于王赓武教授的学术方法、资料运用和理论视野，使他在过去近四十年来所致力从事和积极推动的海外华人研究既有延续性，又具原创性。就前者而言，他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东南亚关系以及海外华人早期历史的论述）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不仅注重历史文献和文本分析，而且意识到中国政治与知识权贵对南洋及华侨观念的演变。同时，他也采用殖民政府档案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方法。但是，他的研究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中国中心观”，努力将东南亚/土著居民的语境引入分析之中。他依靠殖民档案，但也充分意识到殖民统治者所建构的文献资料背后的统治（或分而治之）的政治动机与权力关系。他熟知施坚雅、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但并不是以社会科学的范式和理论为出发点和归结处，而是以问题意识作为切入点，并透过对历史个案和宏观进程的分析尝试把握海外华人发展中的规律、模式与前景。这种分析同时注意到了地方、区域、中国与全球进程的交织作用与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特征，海外华人研究逐渐被接受为一个独立的跨学科和跨区域的研究领域。王教授在该领域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导航者的作用。

三 若干评论与启迪

前文尝试分析了王赓武教授的海外华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就像任何学科的开拓人一样，他的研究及其方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毫无争议。例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些中国及海外学者对于他的《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22]有着激烈的争论与批评。该文指出，将“华侨华人”联接起来使用是很不恰当的，而“从接收移民的国家来看，如果提高了华人移民的地位，那就既没有华侨，也没有华人”。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和研究的切入点来看，是否有些可能商榷之处？笔者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向王教授及读者请教。

首先，关于研究者的定位和视野问题。如前所述，王赓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双重视野，这使他能够站在区域高度把握华人作为一个族群的演变。对于笔者的这一提法，王教授表示：“他〔按：指笔者〕使我意识到我也许知道我正在做，但并未进行批评性的自我审视的事情。双重视野既是一种裨益，也使人无法专心一意（distraction）。这是一种帮助，因为它给我更多的空间去讨论一些敏感的论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障碍，它使我无法更深入地探讨一些课题和进程，因为我同时观察着几个不同的方向。通过提请我对双重视野的注意，刘宏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方法既有其益处，但也可能阻碍了我就我的资料进行更多的挖掘。”^[23]

我想，王教授在此固然反映了他一贯的谦虚和诚恳的态度，但或许我们也应该随着他的思路进行一些思考。一方面，由于这种双重视野，我们或许失去了作为传统型历史学家的王赓武可能给我们就具体的实证资料所提出的观点与分析（如同他的早期著作《南海贸易》和《五代时期华北与权力结构》所显现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针对不同话题的宏观性阐释。尽管这些阐释可能主要是建立在广泛的第二手文献基础上，但其眼界、综合性及内在逻辑性却依然使之成为海外华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如何在专与博的基础上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点，的确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如果借用绘画美术原理来看，王教授的早期著作可能更多的体现了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原理，对研究客体进行多层面的、实证性的解剖与再现。而他近二十年的著作，采用的更主要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笔法：“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站在一个制高点（“天眼”），以大观小，对所描绘物体进行俯视，并看到其关联之处。

其次，关于海外华人与“地域性”（territoriality）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王教授关于海外华人长时段的历史以及横向的模式大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参照系，例如，他对海外华人在政治上的三类人的划分基本上是根据其对国家〔无论是居住国还是出生国〕来划分的。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划分与构成是否如此齐整？东南亚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用于其它区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我们是否需要对新生的跨国华人力量进行更多的注意？在研究中是否应该放松民族国家话语的束缚？例如，美国华人陈香梅长期游走于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政治圈中，最近更在上海浦东参与大规模房地产开发（香梅花园），她应该属于哪类华人？再如，近二十年来中国新移民穿梭于中国大陆和海外居住国之间的“哑铃模式”及其新的认同形态（既非落叶归根，又非落地生根）如何影响当代海外华人的政治与社会格局？^[24]

对于笔者以上的评论，王教授表示：“他正确地指出了我较慢地考虑到民族国家潜在的重要性的降低。”但他同时也强调，民族国家不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现象，即使是稳定和自治的跨国机构也必须依靠于现存国家体制的支持才能存在。^[25]笔者对此亦有同感，只是认为在“后民族国家时代”，跨国因素的重要性应获得更多的重视，建构于东南亚民族国家经历基础上的理论范式恐怕无法完全适用于当今的新移民世界以及北美的模式。因此，虽然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在

1950年代东南亚土著民族主义高涨和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就已衰亡，^[26]但在世界范围内，在世纪之交，新型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有可能再生，它集地域、文化和政治于一炉，并将其主要诉求建构于超民族国家之外。^[27]

综上所述，尽管不可能每个人都完全同意王赓武教授的观点和方法，笔者相信，他的方法论和学术视野对于海外华人研究者仍有极大的启迪。有些因素是恐怕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数人无法学到的（如深厚的家学渊源、对中英文的掌握皆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学术政治经历等）。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王赓武教授的经历和治学方法中得到启迪。对于笔者来讲，以下三点是最为明显的：

其一，不划地为牢，而是采取开放的与包容的治学方法。当1960年代中期王赓武的博士论文出版时，他在中国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学术地位已经确立；但他并未因此而固步自封，将自己局限于传统的史学方法和中古史领域，而是以此为基础，进而扩展到对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和海外华人的研究，并参考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海外的视角来看中国，同时关注后者对其南方近邻的影响。这种不间断的双向运动构成了王教授学术生涯及其成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其二，扬长避短，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关注其社会功能。在笔者看来，王教授的学术中心的“南移”（及其后来的“北归”）其实部分地反映了他灵活的治学策略。由于中国的关闭、学术资料的匮乏以及不利的政治环境，汉学（或中国学）在南洋无法受到足够的重视，也难以同欧、美、日等海外汉学重镇一较短长。而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重写历史的需求、华人族群的认同演变等课题，则成为渐受关注的“区域性知识”。王教授由中国史入手转向南洋及其华人社群，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马来文知识和当地背景，可谓学术策略上的扬长避短。而到了澳洲和香港后，他又能够回归初爱，并将全球视野融入其中，使他的中国研究变得更为完整和立体。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在学术与现实中保持相对的平衡，并使两者能够相得益彰，这对于身处大变局时代的学者，诚为一项深具意义的挑战。

最后，勤奋的治学态度和诚恳的处事哲学。王教授虽然早已声名远播，且身兼诸多行政和学术职务，但在其72岁高龄，仍然不断吸收新信息和新观点，并屡有新作问世。^[28]他坦言，读书、听音乐仍然是其最大的爱好。最后，笔者愿以一段专访作为本文的结语，以与读者共勉。

“刘宏：最后一个问题，您从一九四七年上大学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您对年轻人最重要的忠告与建议是什么？”

王赓武：（沉思片刻）尽量做你所爱好的事。做学问不能勉强，如果你真的喜欢、又适合自己的性格，那么，做事就不会觉得辛苦，而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不要追求金钱和舒适生活，这些到最后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发挥你的长处，尽量从这里去发展。当然，我要加一句，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环境很重要，无论什么喜好，还是要适应环境。我觉得我个人很幸运；我一生做学问，都是在很自由的环境下，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知道许多很好的学者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的才能无法发挥，很可惜。因此，我也特别佩服那些在困难环境下做了了不起的学问的人。我自己是在很好的环境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尽我的力量”。^[29]

[参考文献]

[1] 它们包括，为香港《地平线月刊》所作的新世纪封面人物专访（2000年第一期）；为新加坡及美国新泽西的八方文化企业出版公司主编的《坦荡人生·学者情怀——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2000年版）及《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与黄坚立合编，2002年版）；以及参与由澳洲塔斯美尼亚大学何包钢教授发起和组织的英文圆桌论坛“论王赓武的学术”（2002年9月20日；另外两位报告者为崔之元博士和黄坚立教授）。

[2] 有关王赓武在1980年代末之前对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观点与著作的介绍，参看黄昆章·记王赓武教授 [A]·刘宏·坦荡人生·学者情怀——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 [C]·15-33。

- [3]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2 (1982), pp. 74 - 78. 《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多元学术观点。
- [4] 有关王宓文的生平及学识, 可参看王赓武. 王宓文纪念集 [Z]. 新加坡: 八方文化企业出版公司, 2002.
- [5] [6] 刘宏. 生命之树常青——专访王赓武教授 [J]. 地平线月刊, 2000, 1.
- [7] Endymion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Cambridg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2000), p. 822.
- [8] [11] 王赓武. 单一的华人散居者? [A]. 刘宏, 黄坚立. 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 [C]. 新加坡: 八方文化企业出版公司, 2002. 3 - 31
- [9] [19] 该书的中译本由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于 1969 年初版, 1988 年再版。
- [10] 王赓武. 南洋华人简史 [M]. 台北: 水牛图书出版公司, 1969 年初版, 1988 年再版. 4.
- [12]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1992), 序言.
- [13] 何泽. 王赓武与政治有不解缘 [J]. 亚洲周刊, 1990 - 05 - 06.
- [14] Lee Kam Hing, "Three Approach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s: The MCA, the DAP and the GERAKAN," in Zakaria Haji Ahmad,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王国璋. 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 (1955 - 1995) [M]. 台北: 唐山出版社, 1999. 68 - 69.
- [15] 斯蒂芬·菲茨杰拉德 (Stephen Fitzgerald). 王赓武在澳洲 [A]. 刘宏. 坦荡人生. 学者情怀 [Z]. 48 - 55. 菲氏为澳洲首任驻华大使。
- [16] 本节的写作受益于何包钢的报告《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 王赓武对社会科学看法》(Betwee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Wang Gungwu's View on Social Sciences)。特此致谢。
- [17] Wang Gungwu, *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Singapor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9).
- [18]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N. S. W.: Allen & Unwin, 1996), pp. 1 - 14.
- [20] 可参看王赓武.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之研究 [A]. 王赓武. 中国与海外华人 [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4. 233 - 262.
- [21] 亦可参看. 移民及其敌人 [A]. 王赓武自选集 [C]. 159 - 187.
- [22] 王赓武自选集. 206 - 222. 有关的部分争论文章收录于潘明智. 宗乡会馆与海外华人 [C]. 新加坡: 玲子大众传播中心, 1996.
- [23] 王教授于 2002 年 9 月 21 日致何包钢、崔之元、刘宏、黄坚立的电子邮件。
- [24] 对有关问题的讨论, 参看拙作. 跨国华人: 实证分析与理论思考 [J]. 二十一世纪 (香港中文大学), 2002, 6.
- [25] 王赓武, 同上电子邮件。
- [26] 王赓武. 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 [A]. 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 [C].
- [27] 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nese Nationalism: Crit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April 10 - 11, 2002).
- [28] 仅以 2000/01 年一年为例, 他的著作就包括: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0);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Only Connect!: Sino-Malay Encounter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 [29] 刘宏. 生命之树常青——专访王赓武教授。